目　　录

我对新民小学的几点回忆……邓止戈（1）
关于解放前我在贵定被捕前后的情况……王树艺（4）
解放贵定前后……杜书华（16）
※　　※　　※　　※
贵定欧亚烟厂建厂前后……欧寿祺（20）
我任贵定县联社经理的前前后后……
……胡端正（口述）胡诚（整理）（24）
回忆解放前的贵定税务机构……王凤池（35）
解放前贵定人经营的汽车行……胡端楷（39）
贵州省银行贵定分行简介……邱晓茹（42）
我们经营的四联烟行……王公衡（48）
贵定陶瓷生产的过去和现在……罗先荣（54）
舒洪兴烟庄……胡端楷（59）
※　　※　　※　　※
记贵定国民学校师资训练所……钱安进（61）
回忆都六新民小学……肖应鹏（65）
我所知道解放前的旧治小学……安我椿（69）
解放后贵定县旧治小学的发展……梁培乾（71）
贵定同济诊所从成立到结束……李世凯　万志坚（79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贵定第一座新式教室……车世俊（81）
贵定城的第一批女性中学生……季兆秋（83）
贵定留省学生在县城的话剧演出……胡端楷（86）
※　※　※　※
段兆鳌和他的《山蚕浅要录》……叶茂生（90）
再述戴戡事略……戴聚懿（96）
回忆贵定的三位同学……熊绍儒（106）
沿山七人坟……肖子笑（110）
※　※　※　※
回忆旧治第一次解放……姚　志（113）
解放初期土匪攻贵定县城被歼记……肖子笑（117）
解放初期贵定军管会宣传队的回忆……夏　顺（125）
※　※　※　※
且兰兵乱纪略……杨景山（遗作）肖应鹏（供稿）（127）
解放前我在贵定工作时的几点回忆……杨可文（129）
“行宪”时期的贵定……罗先尧（133）
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议会制度
和贵定选举……胡庆民（137）
解放前的贵定保卫团教导队与常备队
……杨　旭　车世俊（140）
解放前贵定沿山区的乡镇划编……彭　刘（143）
大闹福音堂……肖子笑（145）
※　※　※　※
贵定城关自来水站的兴建和发展……王建坤（149）

修贵定县独木河大桥……
…… 梁建昌（口述）贾仁礼（整理）（155）
贵定独木河的路和桥…… 钱安祥（158）
※ ※ ※ ※
贵定烟叶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…… 胡端楷（160）
贵定的明苑天麻…… 朱国治 朱国元（164）
贵定挂面…… 徐承钧（171）
沿山的百合贡粉…… 杨 旭（173）
※ ※ ※ ※
令人景仰的冯玉祥将军…… 涂玉元（175）
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在缅印战场
对日作战的回忆…… 王及人（178）
※ ※ ※ ※
兴建独木河大桥的见闻…… 王建坤（189）
白马山麓斗贪官…… 罗光尧（190）
我所知道的新民小学…… 罗华昌（191）
※ ※ ※ ※
读者·作者·编者·…… （192）
编后…… （196）

我对新民小学的几点回忆

邓止戈

肖应鹏同志写的《回忆贵定都六新民小学》所述情况，是符合当时实际的。

至于谈到我在该校的情况各节，当时他们不是党员都不清楚，因此我补充说明几点：

一、四〇年十一月间，我是因贵州伪省府、伪党部严緝我，并在全省水陆交通等关卡设守查拿；同时我亦急需找个安全地方住下，以便回党联系。我问当时做交通工作的廖彬同志是否有这种地方？廖说："有个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所小学，校长姓谭，是拥护党的革命青年。当地的区乡伪干部都是少数民族担任，比较安全……"。我同意后，廖把我带到贵定县都六新民小学来了。

到都六和谭兆熊同志谈话后，谭为了掩护我工作，就叫我担任代课教师，住在学校。廖即为我到各地送信联系……。

二、我在都六期间，新民小学就成为贵州地下党的临时联络点了。当时在贵州地下党省工委作秘书的杜守墩同志先后派龙有光（即当时化名的矮子老黄）到都六来联系（龙解放后在云南工作，前年去世了）。以后又派一个姓雷的同志

到都六来联系过。

最后因我要去南方局，杜守墩同志也到都六给我的路费和衣服等……。杜守墩同志还在，现住贵阳青云南路25号附41号。你们还可以请他写当时所知情况。

三、我在都六时，因感到时局恶化，可能内战，如到内战环境，贵州就会大有可为。但我因刚从平越（福泉县）逃出的关系，急需向南方局汇报。如果党要我们回贵州工作时，当然很想利用都六新民小学这个地方作为活动的一个据点。后因南方局要我到延安，以故我离都六后就未回来了。

四、当时都六新民小学的教师谭兆熊、黄祯焱、杨春学、聂成贞、肖应鹏等都是很好的革命青年。不过我走后，可能他们即失掉地下党的领导了。但对他们当时的革命作用，应予肯定。

邓止戈于成都十二桥街省委干休所

一九八三年元月十五日

编者按：

肖应鹏同志写的《回忆都六新民小学》，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后寄给邓止戈同志审示。

邓老对我县文史资料工作很关心。他对肖文作了部分修改后又寄回，同时补充了上述材料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邓老是解放前贵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，现在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顾问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。我们认为他写的补充材料是很宝贵的近代史和党史资料。现征得邓老的同意，将信的内容摘要刊载。

题目是编者加的。

关于解放前我在贵定被捕前后的情况

王 树 艺

解放前，我在重庆和上海等地因长期参加中国木刻协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，并和文化界同志在《新华日报》发表反对国民党的声明。因此，一九四七年国共谈判破裂后，国民党大肆逮捕革命人士，我在上海已发现有特务盯梢，有再度被捕的危险（因一九四三年我在重庆已被逮捕一次），便和原社会教育学院的同学、地下党员张恒、谷平商量后，决定暂时先回贵州躲避一下。张恒劝我到贵定去和他妹夫段其豫以合伙做烟叶生意为名隐蔽下来。

张恒同时也写信给他的父亲，劝其把田地卖掉一部分，拿钱交段其豫合伙做烟叶生意。这个计划如成功，他就从段其豫手中把钱套取出来，和我一起设法到巴黎学画，有机会再转到苏联去。一九五一年土改时，这封信被贵定土改工作团查出，说张恒劝地主卖地，转移财产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，加上一九三九年叛徒特务王醒华带领特务到他家里逼他自首的事，就把张恒叫回去交农民斗争后，开除党籍，判三年徒刑投入劳改，以后"削职为民"。直到一九八一年初才得到平反，恢复党籍，恢复工作。

一九四七年秋，我们到了贵定住下来，多年搞的是革命文艺工作，用木刻作武器，现在木刻只好暂时搁下。我想找地下党的关系，有一次我到贵阳找到初中同学、曾是地下党员的×××，想从他那里打听一点贵州革命活动的情况。他支吾了几句，反而盘问我来贵州的目的、有何任务、和哪些组织有联系等等。我一听，感到不大妙，应付几句就走了，不料他却向保安司令部情报处密告了我。原来他在一九四〇年贵阳大逮捕时外逃，因在外不能吃苦，回贵阳自首叛变，接受了监视、密告革命者的任务。

一九四八年，谷平从上海回贵定开展地下工作，他想搞一些武装，我和他跑了几个地方，分析了当地的形势，均不理想，暂时只能搞点进步书籍和翻印一点材料组织几个进步青年阅读。后来我和谷平又商量叫谭兆熊活动去当城关镇镇长，打进伪县政府去了解情况。但不久我就被捕了。

一九四九年八月底，国民党贵定县党部书记长王醒华（叛徒）忽然派人送来一些纸，叫我和我的爱人罗文宪画反共宣传画和蒋介石的像。他们要出墙报画刊纪念“双十节”（国民党的国庆节）。并说，希望我们能为他们的墙报增点光彩。我见是县党部派来的任务，不免暗暗吃惊，感到麻烦事就要降临了。但我们不能画这样的画，只好婉言谢绝了。

又过了两三天，那人又拿来了纸笔，一定要叫画，口气硬了许多，说是书记长叫画的。我感到事情不妙，联想起半年前在一次毕节同乡开设的“恒恒公司”驻贵定收购处举办的酒席上，王醒华的前任书记长周开运和我同席，他不认识我，主人也没有介绍。席间，他忽然向在座的同乡打听起王

树艺的情况来，主人马上给我们介绍了。当时我也暗暗感到吃惊。心里想："县党部已经注意搜集我的情报了"。这次王醒华叫画反共宣传画是敌人搞的"火力侦察"，目的是试探我们肯不肯为他们的反共宣传服务。替他们画，生命暂时可以不受威胁，但就要丧失革命气节，就会与他们同流合污，滑到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上去；不替他们画，可能有被捕、坐牢，甚至杀头的危险。

一九四六年，"四八烈士"牺牲的时候，当时《新华日报》要发行专刊，急着要用烈士的木刻遗像，周总理叫他的秘书陈舜瑶来找我和王琦去刻，当时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刻木刻，有可能被国民党逮捕、杀头的危险，但是我们毫不犹豫地随同陈舜瑶到"办事处"去完成了任务。这一次却是国民党县党部叫画蒋介石的像，不画也有被捕坐牢的危险。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，我和贵定地下党的谷平同志商量对策。我们共同的看法是：画，不行；不画，也不行。为了麻痹对方，答应替他画一张孙中山先生的油画像，以缓和一下紧张的局面，再采取对策。我已打算好，如果他们不同意画孙中山先生的像，我立即带着妻儿搬家远走，再次去过逃亡的生活。但目前要争取时间，作一点经济方面的准备，收拾一些衣物行李。

但是，敌人是不会让你打如意算盘的。就在他们被我拒绝画画的第二天上午，街上正在赶场，我爱人带孩子上街去了，我也想出去看看。当时我们住在县府路谢光裕家，对面就是旧县府和县党部的围墙。那几天，县党部的围墙倒了，所以从县党部里就可以看到我家。我刚一出门，看见对面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党部倒了墙的地方，王醒华站在那里，他见我开门出来就主动走上来和我打招呼，一边招呼，一边就走进我房子里来，我只好请他屋里坐，他四面环顾一下，翻翻我桌上的书籍，寒喧两句就走了。我正要关门出去，埋伏在门外的两个特务就闯进门来，说一声“书记长请你”，就把我架走，送进县政府监狱的铁门，马上给我钉上十多斤重的大脚镣，随即抄了家，把我爱人罗文宪也逮捕了。

罗文宪原于一九三八年在湖南桃源女中读书的时候，就曾在桃中地下党员陶蒲生（现在湖南省医院）同志的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。一九四〇年在湖南保靖县模小教书时，就参加了地下党。一九四一年，保靖邻县的花垣地下党负责人被捕，组织上紧急通知她立即撤退，自保关系。她逃出后辗转到了四川，读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，后又读国立艺专。在重庆等地的革命斗争中，积极带领一批进步同学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。较场口事件中，她和一批同学都积极参加，郭老被特务推倒时，她们一批学生冲上去保护，几乎被特务打伤。到贵定后，又参加谷平和我们的一些活动，所以这一次被抓到贵定县政府关了大半天。她被抓后，家中孩子无人管，也无人给我送半饭。她就向伪县府提出要求：一是家中丢下的吃奶孩子无人照管，二是两人都关起来无人给送饭。她说：“王树艺关在牢中，我要给他送饭，决不会逃跑的，我请人担保随传随到”。这样，才把她放出来，但也经常传她去审问。

我是搞革命文艺工作的，木刻是我的战斗武器。他们来抄家，也着重抄木刻和进步书籍，顺手把一些稍为值钱的东

西也拿去了。那些东西并不可惜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但是，十多年的木刻作品，连同原板一下都被毁掉，没有比这更使人痛心的了。

特务们审讯政治犯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因为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。他们抄走我反对国民党的木刻，剪贴的报纸文章等。说我攻击政府，宣传赤化，煽动群众起来造反，但还不满足，还想打开“组织”缺口，几次刑讯逼供都是王醒华亲自坐堂问的。他得不到他们所想要的材料，就换了花招：一方面传罗文宪晚上去县府“问话”。一方面却告诉我晚上去和妻子见面，“有什么要说的，你们趁早说说”。王醒华叫人暗示我：“这是你夫妻最后的时候了”，用这个办法给我施加压力。我考虑他们这样做有两种可能，一是当着妻子的面对我用刑，使她受不了而招供；另一个可能是叫我们夫妻见面互通消息，他们从旁偷听。我把这个情况赶快托送饭的难友家属转告罗文宪，叫她夜间不管见到任何折磨我的情况都要沉着，不要乱讲。果然夜里把我带到他们的会客室去和妻子见了面，罗文宪有意地哭着诉苦，我也故意流了泪，用暗语和她交换了意见。王醒华的花招又落空了。

家里每天都来送饭，同时给我带来外边的一些消息。谷平几天前因事到贵阳去，得知我被捕后，立即躲进一家医院当“病人”躲起来。我们是外地人，在贵定几乎是举目无亲，爱人为了营救我，精神上受折磨，使她几乎发了疯。

每次送饭，女儿哭着一定要到牢房看爸爸。隔着牢门伸着两只小手拼命往里抓，要爸爸抱，她妈只好把她从送饭的

小洞里塞进来，和爸爸一起坐牢。牢里没有什么玩的，又哭着要爸抱她“上街”。后来她发现爸爸脚上的铁鐐是件新鲜的东西，就叫把铁鐐绷紧，让她站在上面当作秋千玩。

千百年的监牢，传下了一些“牢规”，凡是新“犯人”进“号子”，首先要向老“犯”、特别是向“威望”较高的老犯“拿言语”（说好话），要求“多多关照”。否则就要受折磨，罚你在粪桶边尿湿的地上睡，吃饭守着粪桶吃……我一进号子，正为这件事犯愁，不料他们见我一进监就带上沉重的脚鐐，知道是个“要犯”，悄悄地向狱卒打听我的案情。一听说是“共产党”，就围上来问长问短，十分同情，忙着给找个好地方，并把几块难得的木板给我搭床铺，还劝我不要着急，要保重身体。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而坐牢的，尽管每个人的悲惨遭遇不相同，但对反动政府都有共同的仇恨。

我坐国民党的监牢虽不是第一次，带脚鐐却还是头一遭。十多斤重的铁鏈子拖着走路，十分吃力，几下子就把脚踝磨破了皮，鲜血直流。他们就教我拿一根带子把鐐挂在裤带上，行走时就不往下坠了。裤子太脏，带着脚鐐怎么换裤子呢？正在犯愁的时候，他们又教我换裤子的办法。

每当夜半更深押我去过堂时，难友们都要等着。见我没有受刑，才放心去睡觉，万一是带伤回来，大家就替我擦洗。让我躺好以后他们才去休息。

在我坐牢的一个多月里，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，解放军已进军贵州。十一月九日，爱人送饭的时候特别高兴，她悄悄告诉我，传闻解放军已占领马场坪，离贵定只有三十多公里

了，计估一两天内，贵定就可以解放。我也十分高兴，盼望已久的日子马上就要到来。连做梦也见到军帽上缀有红五星的同志打开牢门，把我放出来。但是也存在着第二种可能，反动政府在溃逃的时候会把犯人干掉再走……盼望和焦急的心情交织在一起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
伪县政府内部正在作逃走的准备，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。十号凌晨，狱卒突然把我从床上叫起来，随即用大铁撬棍把鐐撬开。莫非“那个”时候到了？我正在猜想的时候，几个带枪的士兵把我五花大绑带到伪县府的院内，但又不马上押走，不知在等什么。这时伪县府内一片慌乱，人们匆匆忙忙地搬东西，一批批的民夫挑着沉重的箱子往外走，县长带着他的下属，携儿带女，仓惶逃跑了。果然，他们临行前，把关在另一个地方的政治犯枪杀以后才逃走，我因为是贵阳叫逮捕的，所以押赴贵阳。

我请狱卒去叫我爱人，不一会，她背着孩子，披着散乱的头发哭号着来了。想安慰她几句，但不知说什么好。她拉着我被反绑着的手臂，呼天号地哭着。孩子见爸爸被绑，哭着大叫“放开我家爸爸”。幸亏邻居们提醒，罗文宪才去给我收拾点衣物，煮两个鸡蛋喂了我。这时一个军官（后来才知道他叫袁副官）从里面出来，叫把我押走，据说是押解到贵阳去。爱人替我拿着小包袱，随着押送的士兵，到车站去，他们拦住一辆货车，就催喊叫着“快上快上”！双手被反绑着的我哪能爬得上去，他们只好把我拖上车。背着孩子的罗文宪这时候倒不哭了。我看见她那丧魂落魄的身躯在寒风里发抖，呆呆地站了一会，忽然哭着追上来，我的眼睛也模

糊了。

我们坐的是一部木炭车，走几步就得停下来摇摇鼓风机。一上坡就喘得爬不动，司机助手赶快在后轮下面垫上一块三角木。就这样一路停停走走，走走停停，七十多公里的路程，足足走了一整天。车上堆放的东西太多不能坐下，手被绑着又不能去抓住什么东西来稳住身体。车一摇晃，身体就东倒西歪，扑前碰后，身上碰伤不少地方。手腕和上臂被绳子勒紧的地方最初是痛，后来两臂发麻，待到捆绑的部位肿胀起来以后，麻和痛的感觉都没有了，只是胀得难过。

晚上十点钟，终于到了贵阳。下了车，腿也不听使唤了，勉强拖到保安司令部，到监狱的木栅栏外边，我一下就坐倒在地上，看见栅栏里边在暗淡的灯光下，几个“犯人”以惊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新伙伴。袁副官和一位值班副官交涉，交上公函，那位值班人员看过后说：“你们来得太晚了，从下午起，我们不再收犯人了”。袁请他再去请示“上级”，他说：“上级已经走了，明天一早我们也要撤走的”。“那么我们送来的这个犯人怎么处理呢”？回答是“你看着办吧，带回去自行处理也行”。袁副官说：“我们县政府已经撤退了，我回去找哪个处理”？“你带到对面情报处去试试，看他们收不收”？我只好又跟着到对面的情报处，那里也不再收“犯人”。

第二天，十一月十一日的早上，保安司令部关押的那几个“犯人”被一辆卡车拖走，拉出去杀害了。这就是轰动贵阳的“双十一”死难烈士。我真要感谢那辆破木炭车，是它特别慢的行车速度，拖延时间挽救了我。如果早上到达，

我被收监以后，很可能和遇难的同志们一起，也成为“双十一”的烈士了。

离开情报处，大约已是深夜下一点了。一整天没有吃东西，我又累又饿。袁副官见几处都不肯收人，到处都在撤退，感觉到反动政府马上就要垮台，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，现在的阶下囚说不定就是明天新社会的主人，解差的威风变成讨好的笑脸。马上给我松了绑，带我到他熟悉的一家小旅馆去找东西吃。我问他：“袁副官，你看我们以后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明天只好回贵定去”。我说：“你们县政府不是都跑光了吗，你还回去找谁？”“我回去说不定还可以找到他们，不回去向哪个交差？”这个可怜虫，已经认定反动政府注定垮台了，却还想去找上级交差。事实上他的上级主子和他一样，也成为没有主子的丧家犬到处流亡去了。临睡觉的时候（他两人把我夹在中间睡），他带着笑脸说：“王先生，大家都是汉子人，我们解了你的绳索，希望你不要逃跑”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随他们去车站，打算找辆便车回贵定。他叫那个小兵（记不得叫什么名字了，我只好以“小杜”来称呼他，此人现在贵定烟叶调拨站工作）看着我，叫我们不要乱走，一定要在车站里等着，他要去接×科长的太太同回贵定去。这时候，车站上十分混乱，去贵定方向的客车早已停开，往昆明、重庆去的车上，人群挤得连缝隙也没有。街上也挤满了逃难的、搬家的人群，一些散兵游勇趁火打劫，全城处在一片混乱之中。

袁副官去了不久，估计离车站较远了，我故意问小杜：

“你知道他到哪里去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来过贵阳吗？”

“没来过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去找找他，早点回去。”

我就带着小杜出了车站，怕真是碰到袁副官不好办，我们专走小街小巷。

小杜当兵不久，是被抓来的“壮丁”，原来是乡下农民，十六、七岁的年纪，没有出过门。他跟着我东走西走，走了半天也见不到袁副官的影子，急得快要哭了。我故意问他：“我们找不到袁副官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他可怜巴巴的说：“王先生，你走哪里我都跟你走，只求你不要把我甩了。”这时候已是中午，我也饿了，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只好带着他到我姐姐家去找饭吃。

我从贵定押解出来，时间虽只有短短的两天，但贵定已经解放了。家中不知道我的下落，谣传却不少，有说已经在贵阳被枪毙了的，有说在贵定郊外被活埋了的……都认为我已不在人世间了。

我一走进姐姐家，他们又惊又喜，我趁姐姐带小杜去吃饭的机会，和姐夫商量下一步的办法。认为贵阳情况十分混乱，伪军撤走时不断枪杀好人，卢燕也被杀害了，留在贵阳危险很大。加上妻儿都在贵定的情况，也是我急于要知道的。从各方面的情况判断，贵定肯定已经解放。因此，决定从小路向贵定方向走，说不定不到贵定就会碰到向贵阳挺进的解放军。

小杜一同回去也有好处，我们给了他几块钱，和他说好，如果路上碰到贵定县府的官员，就说贵阳不收人，已经取保释放了。同时我也不忍心把这个无辜的小兵——才穿军装不久的农民丢在贵阳，让他流落街头。

回去的路上，只见一些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士兵，很少见到一般老百姓。小杜跟着我，就像是我的勤务兵，所以也没有人来盘问。只是天雨路滑，泥泞难行，倒是跌了不少跤。次日，走到贵定县属的都六乡，离县城只有四十华里，马上可以进入解放区，享受人身自由的幸福和家人团聚的欢乐。经过监牢的折磨，才更深刻地体会到自由是如此之可贵。我们走进一家小客店休息，正要吃点东西的时候，突然看见街上有人在奔跑，伪保警大队长王仲礼带着几个兵盘查行人来了。我连忙起身想从后门溜出去，王仲礼眼尖，马上把我叫住。他看小杜跟着我，十分诧异。问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，我说在贵阳保释回来的。他问袁副官呢？我说他去接×科长太太，她不肯走路，袁副官陪她找车去了。王仲礼满脸疑虑的神色，使我暗暗捏了一把汗，幸而小杜出来向他报告说贵阳不收人，是保释出来的。王问我打算到哪里去。我说回贵定。他说贵定已经丢了，你跟我们队伍走算了。我一边答应一边对他说："我离贵定时，和妻子约好，叫她们到都六乡朋友家避难的。现在我要去找她"。他问："在哪家"？我随便说了一个名字。他说："快去快回，找不到就马上回来。"我转身走出小店后门，朝屋后的小路走去，转了几个弯，就没命的飞跑起来。

王仲礼心神不定地去盘查行人，是因为半个钟头以前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